

日本侵华实施奴化教育的一面镜子

——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

熊贤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宋恩荣、余子侠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向这一伟大胜利献上了一份厚礼,为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的反人类的奴化教育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这一面镜子,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可以剥去日本帝国主义的伪装,看清其反人类的嘴脸,认清其奴化教育的本质。

—

宋恩荣、余子侠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作为“全史”,共分 4 卷,余子侠、宋恩荣所著之第二卷,以其时的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和察哈尔)为审视对象,系统而全面地分析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所实施的奴化教育。

作为一部《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它全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实施的奴化教育。而作为第二卷,则全面而细致地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所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扫描分析。这在资料的占有上,说它“全”可以说是受之无愧的。资料之“全”,是其显著的特点,与《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之“全”相映衬。

作为遍求其时诸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盛京日报》、《新民报》、《救国时报》、《大公报》、《实报》、《晨报》、《世界时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以及其时国民政府教育文件、《教育杂志》、《东方

杂志》、《教育通讯》等期刊上面所登载的日本侵华实施教育的资料。这些报刊所登载的报道、时评与学术研究文章,既有日本帝国主义所实施的奴化教育的原形,也有时人对其所实施的奴化教育的批判与揭露,还有丰富的中国人民反抗奴化教育的斗争。这些资料也是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实施奴化教育的一部分。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又径直进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山东省教育厅、伪维新政府教育顾问室及日本北支那社等日伪政府机构内部,剥开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法制局编《华北政务委员会法规汇编》、伪维新政府教育顾问室编《维新教育概要》、伪山东省教育厅编《教育法令汇编》等奴化教育直接实施的政策法规文件。还收集到了侵略者仲摩照久所编《热河讨伐及热河事情》、田中次郎的《山东概观》、岸元吉所著《青岛及山东见物》等睁着眼睛编制的弥天大谎。藉此,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侵略者是如何把白的说黑,将黑的说白的“全”过程。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还注意收集当事人或是接受了其奴化教育者的感受等回忆录、口述历史。作者注意收集从全国政协到地方市县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藉此了解在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学校学习及其见闻,以捕捉到他们的切身感受。如政协河南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山西省长治市、河北省邢台市委员会等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均拉入第二卷考察审视的视野,不仅与第二卷中伪政府、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相映衬,也使广大读者读后感同身受。此外,第二卷还收集了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地方教育史志资料。这些地方教育史志资料中“口述历史”和档案资料的特色兼而有之。

与日本侵略华中、华东及华南等地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对华北五省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并不是从大举进攻后才开始的。作为一

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自然只是写七七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如果仅仅关注这一时期，显然与“全史”的要求与原则相背离。事实上，日本在中国插手教育，实施奴化教育由来已久。在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所办的教育，远不止是为其侨民所办的教育，已经进入了中国普通教育的深层了，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经有相当的广度了。譬如，清末日本教习在京师便有130人，直隶139人，山东21人，山西26人。这些教习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兜售奴化教育的内容，但也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中华民国初期，随着日本军事势力的逐渐渗入，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教育华人子弟的学校日渐多起来。《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山东胶济沿线设立的教育日人子弟学校与教育华人子弟学校各列了一个表，据此表可以看出设立日人子弟学校仅20余所，而开设的教育华人子弟学校40余所。可见，日本侵略者在大举进攻中国前，对在中国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便颇有浓厚的“兴趣”。

通过《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来看，这一部《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不仅横向的面“全”，纵深的史也很“全”。

二

过去，人们对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和东北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在资料上有一定的披露，因而对其奴化教育的本质有初步的认识，而对在华北五省所实施的奴化教育的本质只涉及其肌肤，而未触及其表里。近些年来，各地掀起了修撰地方教育史的风习，北京市、山西省、山东省、河北省和河南省等地修撰了地方教育史，有的已经付梓出版，有的已经印出了征求意见稿。这些地方教育史稿，对日本侵略者在当地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揭露，但因

为大多系一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限于篇幅,不可能作深刻的揭露。《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则从文化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法规、教育内容及各级各类教育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揭开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的面纱,使中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瓦解中国人民斗志,清洗中国人民仇视日寇的心理,培植恐日亲日崇日精神的奴化教育本质。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从教育宏观指导思想方面入手,从源头上解析日本侵略者侵华实施奴化教育的本质。1938 年 7 月,侵略者制定出《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明确规定伪华北政权所实施的文化教育,要“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府的政策”所确立的宣传教育原则,是以“日满华共存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为基本原则。其“施政方针”是“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归根结蒂,是要“依据东亚民族集团之精神和中国传统之美德,以完成新中国之使命”。而其“训育方针”也都是与所谓施政方针无异的陈词滥调,什么“尽力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精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注重人格之修养、品德之陶冶,宜使学生有以国士自许之志向,俾将来能以担负复兴东亚之重任”等,不一而足。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进入到了侵略者文化教育方针制定过程之中,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其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出笼的全过程与部分细节。作者剖析了伪华北政权重要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根据这一过程人们不难窥见奴化教育思想是如何作为指导思想进入教育方针政策、教科书编撰过程的。在办学方向上,在教学

内容上,将《师范学校规程》、《中学校规程》、《小学校规程》等硬性拉入奴化教育的规范之中。强调一定要完全删除学校工作的一切文件、教科书中的“有碍日本的文章”、“有关爱国思想的文章”,并完全修改为“赞扬日本”的文字。以后虽然还就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政策作了一些新的确定,但无非都是诸如将“中国少年阶级者”培养成“为中日敦睦之先驱”之类换汤不换药的玩艺儿,有时干脆来一个重申前令”。

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在表述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如果直接贩卖日本本土货色,恐怕中国人民难以接受,难以起到欺骗中国人民达到其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儒学、传统伦理道德的“糖衣”将奴化中国人民的“亲日”、“崇日”思想的“炮弹”一层层紧紧地包裹起来,使人们听起来似乎比较悦耳动听,不易识别。《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全面剥去了侵略者的伪装,使其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三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没有像其他学术著作那样,对日本侵略者对华北五省所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一番评价。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实施的长达40多年的奴化教育(包括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是用不着去评价它的。如果用“评价”这个词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估价,那么就太高看它了。他们在中国所实施的奴化教育与西方列强所实施的教会教育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教会教育的确有一部分传教士兢兢业业地在中国做科学和民主的宣传工作,或者他们中有一些人主观上是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有一定益处。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实施的奴化教育,既不存在成绩是

主要的,或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的问题,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于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是毫不足取的。有的只是摧残、践踏和蹂躏。这也许是东方日本野蛮侵略与西方侵略者“文明”侵略的不同所在吧。

因此,笔者赞同《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作者在评价上采取的灵活处理办法,不做任何评价,而是单独辟章立节,揭露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暴行。第二卷开宗明义即是第一章“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垂涎及对华北教育的摧残”。此章中单独立有“日寇对华北地区教育的摧残”一节,对日本侵略者对华北教育事业的破坏和对华北广大师生的迫害给予了全面展示,用大量的事实、数据,告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破坏人类文化,阻碍文化传承的滔天罪行。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对中日开战一年以来华北地区部分高校受损情况进行了统计,仅国立清华大学受损 605 万元,国立山东大学受损 361 万元,私立南开大学受损 375 万元;开战一年后华北地区中小学及社教事业,也受到了灭顶之灾。河北省受损 2277 万元,山东省 4414 万元,察哈尔省 244 万元,北平市 1313 万元,天津市 716 万元等。华北地区图书及图书馆亦遭巨大破坏和劫掠。日本宪兵掠卖北京大学图书馆俄文图书 3700 余册,杂志 136 种;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书刊 32794 册,书籍 4113 册;南开大学在 1937 年 7 月 29 日的轰炸中,损失图书 10 万册。至于华北沦陷区的广大师生惨死于日本人的魔掌或是坐穿日本人所设监狱的,当数以万计。

伪华北政府所开办的普通教育,无法培养出像模像样的人才,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按道理留日学生当有不少脱颖而出者,其实不然。《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统计,从 1938 年到 1943 年,整个华北五省才派出 647 名到日本的留学生。一些学者认为,抗日

战争期间的留日学生教育,为华北地区培养了一些知识人才。而事实正好相反,正如《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所指出的:“借助这种教育形式,造就出能在华北地区全面彻底地贯彻和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亡华’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华目的的高级汉奸和奴化知识人才,使他们归国后在引领华北地区走向全面殖民地化方面能够发挥其‘领头羊’的作用。”所谓“知识人才”鲜见其人。虽然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办学校,施“教育”,为时也不算短,然而并未见到什么“知识人才”,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办学兴教”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自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集中在作为伪华北政权组成部分的伪山东省、伪山西省、伪察哈尔省和伪绥远省及伪北平市、伪天津市的教育档案搜索不够,直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实施奴化教育的资料略嫌不足,从而对所实施的奴化教育的本质揭露力度有所减弱。

(作者熊贤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